

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

□孙绍振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学理论界冲破了封闭性的蒙昧,享受了放眼全球的兴奋,在强烈的落伍感的驱迫下,文学理论界把最大的热情献给了西方理论,一波又一波的新理论被当作普罗米修斯之火种引进,强烈地表现出饥不择食的贪婪,其更新速度之快,可能是创造了吉尼斯纪录,这可以从急于改变弱势文化处境的心态得到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新名词大轰炸”的实质乃是抢占话语的制高点,在话语解放中体验节日的狂欢,由之而产生的最乐观的预期乃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最短时间与世界文论最高水平接轨,在学术前沿平等对话中,展示中国文学理论的更新和建构。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乐观主义多少带着空想的性质。平等对话的起码要求,乃是有话可对,也就是具有自己的、不同于对方的话,如果所说和对方一样,那就是废话。问题在于许多热闹非凡的话语都不是自家的,问题是人家的,大前提是人家,方法是人家的。将西方文论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充其量不过是为之举出中国的例子而已。这就不成其为对话。

西方文论不管什么流派均以对权威的质疑挑战为荣,故天马行空,以原创性和亚原创性为生命,我国学人则鲜有把西方权威当作对手(nival)进行质疑和挑战,故只能疲惫地追踪。在这一点上,倒是美国人比我们清醒,在他们从欧洲引进大量思想资源以后是有所质疑的。刘亚猛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起,被我国理论界奉为主臬的美国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对1960年代以来从欧洲大陆的大规模引进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结论:理论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超脱大度”(impersonal and universal”),而是跟他萌发生长的那个语境所具有的“独特时、地、文化和语言”盘根错节,难解难分。又如,在将理论从其“原址”迁移到一个陌生语境时,人们不管费多大的劲总还是无法将它从固有的“语言和文​​化根基”完全剥离。“那些试图吸收外异理论,使之在本土发挥新功用的人引进的其实可能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使之服务于某些异己利益,产生破坏性效果”。

我们引进的那些西方理论,我们热情追随的“大师”,是不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呢?是不是“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对我们的理论建构“产生破坏性效果”呢?是值得深长思之的。乔纳森·卡勒说过,作

为理论,其本身的准则就是反思。难道我们接受乔纳森·卡勒就不该反思吗?而反思的起码条件就不是俯首帖耳,而是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对西方文论进行质疑,提出西方人没有提出的问题,迫使其接招、就范,此乃改变一代人被动状况的惟一道路。

西方文论所表现出来的智商被认为可以列入当代最高层次。这一点是否毋庸置疑,姑且不论,和他们对话必须有相应档次的智商,则可以肯定。但是,“最高层次”是多方面的组成,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各个方面都是绝对平衡的,其不平衡正是我们应该分析的对象。最明显的乃是在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发挥到极致,这是他们的强项。这一点,可能是世界的共识。要和他们的强项对话,对之发出质疑和挑战,难度是比较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怀着最大的耐心期待着震撼性的成果。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弱项呢?我相信,没有一种学术文化群体是没有弱项的,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在文学审美价值方面表现得极其软弱。第一,号称“文学理论”却宣称文学实体并不存在,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文学》,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导论》坦然如此宣称。事情荒唐到这种地步,除了用“危机”,很难用任何其他话语来概括,这样的危机对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学理论来说如果不敢说是绝后的,至少可以说是空前的。无视于西方文学理论如此之危局,就看不到我们的机遇。第二,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宣称,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的“束手无策”是宿命的,因为,文学理论只在乎概念的严密和自洽,并不提供审美趣味的评判。第三,他们绝对执著于从定义出发的学术方法,当文学不断变动的内涵一时难以全面概括出定义,便宣称作为外延的文学不存在。事实上,由于语言作为声音符号的局限性,一切事物和概念的内涵都有定义所不可穷尽之丰富性,并不能因此而否决外延的存在。第四,他们的理论预设涵盖世界文学,可是他们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却一无所知,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他们的理论雄心是不相称的。西方文论失足的地方,正是我们的出发点,从这里对他们的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美国新批评,从文学虚无主义的解构主义到结构主义,从读者中心论到叙述学)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批判,在他们徒叹奈何的空白中,建构起文学文本解读学,驾驭着他们所未有的理论和资源,与他们对话,迫使他们和我们接轨,在文学文本的解读方面和他们一较高下,也许这正是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好机遇。

由河南卫视举办的“汉字英雄”以及由中央台举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受到全国各界的一致叫好,这好像给目前正面临危机的中国汉字敲响警钟。这种危机不仅仅表现在相当多的国人提笔忘字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且表现在我们一向引为自豪的中国汉字,正一步步被外来语所侵蚀。对此,相当多的中国人不仅无所察觉,而且已经习以为常。有人说到提笔忘字,常常把它与电脑的普及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更多的原因,在于我们对保卫汉语文化已经缺乏一种清醒,对我们数千年的汉语文字,缺乏一种自信。

3年以前,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中央电视台将不得在电视节目中使用外语缩略词如“NBA”、“GDP”、“WTO”等等。这个通知,当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意义都非同寻常。此前,清理汉英混杂现象的呼吁,多见诸报刊和语言学界,“两会”提案、专家撰文也多有涉及,直至以官方行文方式做出具体规定。有论者称,这是以政府主动出击的方式来捍卫汉语的纯洁性,其意义深远。而对此通知,时下网上议论几乎爆棚,拥护者质疑者都大有人在。几年之后,我们发现,对这个带有法规性的政令,社会执行的并不怎么好,一些洋泾浜文字,无论在电视台的播音中,还是在报刊上,照样我行我素。无疑,这对维护中国汉字的安全是十分不利的。

应该说,这些年来,汉英文字混杂的确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时下,无论是书面行文还是口头语言,撒几句洋文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的事情。甚至有的报纸也公开用汉英混杂的形式做标题,比如,像《上海加入LIVES》《MG: My生活的GENE》《哪款AOC,卖到了VDP》等,你能读懂这些标题吗?如果你不是专业英语人员,恐怕很难。可这都是公开出版的报纸刊登的。这些

东西,不懂英语只懂汉语的人看不懂写不了,只懂英语不懂汉语的人同样也看不懂写不了。至于年轻人交往,动不动“n个问题”的半洋半汉的话更是常事。到头来,弄得中国人很可能必须学会英语才能看懂读懂自己的语言。因此,保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历史传统,应该说已是刻不容缓。

“洋泾浜”汉语的流行,已经到了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程度了吗?这绝非危言耸听。

有语言学家这样断言,世界文化史上最古老的三种文字:古代埃及人的圣书字和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已经先后于公元前300—400年消亡了,眼下就只剩下汉字了,伴随着英语的强势“入侵”,如果再置之罔闻,300年后,汉语也将会消亡。看眼下的现实,就知道这绝非妄言。今天社会对汉语的轻视和对英语的盲目崇拜,已经到了非常麻木的状态。眼下不完全是英语的强势入侵,而是我们的文化传承者自我防护能力不够。对西方语言的盲目崇拜,实际上表现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轻视和自信力的缺失。如果任其发展,我们神奇的汉字,有一天就会像甲骨文一样成为只有专家才能破解的文化密码。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强调保卫民族语言的纯洁与所谓的民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部5000年文明史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强调融合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但是融合并非照搬,比如,因先辈的智慧,在引用外来语

理论与争鸣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在近些年是有长足发展的。但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却对文艺批评的这种长足发展缺乏应有的理论总结。这是不利于当代文艺批评的后续发展的。近几年来,《文艺报》为了推进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以与当代作家艺术家包括文艺理论家对话的形式,认真地梳理和总结了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2013年5月,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作家艺术家对话录《文学下午茶》收入了部分对话录。在一些与当代作家艺术家的对话中,不仅可以看到这些当代作家艺术家有关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真知灼见,而且可以看到《文艺报》在推动当代文艺批评发展上所做出的努力。

积极推动文艺批评界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

文艺批评的发展不仅是对文艺作品的好坏高下判断,而且是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如果没有这种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就没有文艺批评的后续发展和深入发展。但是,中国当代文艺界却大多满足于即兴文艺批评,对文艺批评的后续发展和深入发展不是很感兴趣。这极不利于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在文艺批评时不能缺失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这种对文艺批评的反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艺批评家的自我反省,二是文艺批评家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近几年来,《文艺报》倡导文艺批评家的自我反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存在日渐严重的鄙俗气。这种鄙俗气主要表现为有些文艺批评家不是把握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公正地评价作家艺术家的独特贡献,而是以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代替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鄙俗气严重地制约了这些文艺批评家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极大地助长了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中的歪风邪气。中国当代不少文艺批评家在反对这种鄙俗气时进行了相当深刻的自我反省。资深文艺批评家李希凡在对话中回顾了自己大半个世纪文艺批评的风云,既没有像有些文艺批评家那样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也没有像有些文艺批评家那样自以为为自己一贯正确,而是该肯定的理直气壮地肯定,该否定的毫不留情地否定。在对自己文艺批评的深刻反省中,李希凡表现出一个优秀文艺批评家追求真理的无私品格。在哄抬胡适和贬低鲁迅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李希凡没有完全否定过去对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家的批判。与此同时,李希凡对他过去轻视考证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曹雪芹的身世经历,特别是《红楼梦》,只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确实也需要科学的考证工作”。李希凡虽然强烈反对那种认为《红楼梦》是“生活实录”的论调,但在批评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却犯了这种错误。李希凡认为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并不存在官僚主义,并用这种条条框框评论了这部文学作品,还给作家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这就不自觉地陷入了小说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实录”的误区。李希凡没有掩饰这种错误,而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这种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所犯的幼稚病和粗暴的错误。李希凡这种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自我反省是文艺批评发展的不竭动力之一。当然,文艺批评家的自我反省不是变色龙的善变,不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来回折腾,而是追求真理的与时俱进,是服膺真理的自我超越。在对话中,文艺理论家鲁枢元在梳理自己近30年来的文艺思想的发展时既没有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也没有自视一贯正确,而是在清醒认识现实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20世纪80年代,鲁枢元相信人类中心,相信人类的利益至无至上。30年过去,鲁枢元发现人类作为天地间的一个物种太自私、太过于珍爱自己,总是把自己无度的欲望建立在对自然的攻掠上,以及对于同类、同族中弱势群体的盘剥上,有时竟显得那么鲜廉寡耻!鲁枢元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会犯错误的,而且犯下的是难以挽回的错误。鲁枢元这种对自己的文艺思想的调整表现了一个优秀的文艺理论家追求真理和服膺真理的崇高品格。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难以深入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作家艺术家

“汉英混杂”与保卫汉语的纯洁性

□陈先义

上,用音译有了我们今天惯用的“咖啡”,用意译有了汉语“电话”,音译加意译有了今天的“芭蕾舞”。这些文字,都悄无声息地引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大大丰富了汉语的文化表达。史料考证,中国文化史上有三次吸收外来语的高潮,第一次汉唐通西域,佛教传入中国,外来语“葡萄”、“骆驼”、“世界”、“庄严”、“结果”、“现在”、“圆满”等从西域语言和佛语中引入汉语,此后被我们用了数千年。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是舶来品了。第二次外来语高潮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英语中引进了坦克、沙发、吉普车等,从日语中引进了组织、纪律、政府、党、政策等等一类词汇,至今这些词汇已融入我们的主流语言。这些机智巧妙的引用,表现的是先辈们的大智慧,重要的经验是把外来语化为了我们的血肉。

第三次高潮是近些年的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对外交往的扩大,外来语更是似大潮汹涌。毋庸置疑,这对促进文化交往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遗憾的是,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大潮,我们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全面的应对措施,没有像先辈那样在保护自身文化的基础上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将西方语言化为我之血肉,而是用极省俭的办法,将外来语直接输入汉语。于是,WTO、GDP、NBA、CPI、IMF等等直接入文,便成了一种惯常现象。加上一些科技新词如DVD、MP3、IBM等等的大量引入,汉语常常像一种“四不像”的文字。其实,在面对外来语强势

到来时,汉语言的应对办法还是很多的,改造也罢,融合也罢,有先辈经验可资借鉴。关键是重视不够。比如“WTO”入中国时,就用“世贸组织”称呼有何不可? GDP用“国总值”,APEC用“亚太经会”岂不更贴切更便当吗?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直接移来。这种直接搬入法,实际助长了对我们文化的不自信。最典型的,莫过于2003年非典流行了一开始,国人已经习惯用“非典”一词了,可一些报刊后来又改为“SARS”,弄得老百姓不知怎么说好。后来的甲型流感,开始称“猪流感”显然不科学不好听,改为甲流后本来老百姓已经适应了,可见诸公开报刊、电视的说法,又非常别扭地说“甲型H1N1流感”,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它命名的科学和神秘、显示不了与世界接轨一样。说到底,骨子里还是一种文化不自信。其实,在引用外来语中,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做得很好的,比如流行病“AIDS”,专家将音译和意译结合,称其为“艾滋病”,顾名思义,这是因为爱而生的疾病,何其准确而恰当。只是对这样很好的经验缺乏认真的总结和推广。

“洋泾浜”的拥趸者,有一种悖论,认为中国方块字意义太多,太难学,不如26个英文字母易懂易记,随便几个字母组合就是词组,含义深广。其实,这大大误读了中国汉字。据中西方文字学家共同研究考察的结果,以独立单字为单位的中国汉字,无论表情达意还是承载信息、字义

和文艺批评家缺乏自我反省,不能超越自我局限,而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这些作家艺术家和文艺批评家在应对那些激烈而尖锐的文艺批评时不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冕,而是抵制这种激烈而尖锐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在这种抵制文艺批评的风气很盛的氛围里是很难深入发展的。

积极推动文艺批评界对文艺界一些理论分歧的解决

中国当代文艺界的一些理论分歧或明或暗、或显或隐地撕裂着文艺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这些客观存在的理论分歧不能掩盖和搁置,而应正视这些理论分歧并积极解决它。只有正视这些理论分歧并积极解决它,才能促进文艺界的真正团结,才能推进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之所以难以深入发展,不仅是因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缺乏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而且是因为缺乏对文艺界的理论分歧的解决。

近几年来,《文艺报》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和对一些理论分歧的深入解决,有效地提升了文艺批评的理论品质。一些作家艺术家在对话中没有回避甚至掩盖文艺界的理论分歧,而是正视了这种尖锐的理论分歧。文学史家洪子诚在对话中坦承自己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对作家路遥及其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疏忽。这就是作家路遥及其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中国当代年轻人中尤其是在底层艰难拼搏的人群中影响越来越大,而中国当代文学史家则普遍轻视甚至忽视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这种疏忽深刻地暴露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的美学理论分歧。作家赵本夫在对话中尖锐地指出,作家反映现实生活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式,有些作家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喜欢把现实生活残酷化;有些作家则不回避但不执著于揭露现实生活的丑恶,更希望把它引渡到有希望的地方。这并不意味着缺乏对现实的批判力。理想的产生正是对当下现实的不满,描绘理想就是指向现实。赵本夫对作家不同介入方式的区分尖锐地触及到了文艺界的理论分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少文艺批评家没有摆脱非此即彼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无法超越这两种不同介入方式的对立,而是陷入在这种对立中难以自拔。有些文学批评家在作家柳青塑造的人物形象梁三老汉与梁生宝孰高孰低上的分歧就是他们在美学理论上的分歧,而不是一些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所谓话语权的争夺。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

艺术世界里,梁生宝都越来越焕发出魅力。这恐怕是那些哄抬梁三老汉这个艺术形象的文学批评家所没有想到的。然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却存在一种告别文艺理论的倾向,提倡“存在即合理”的粗鄙存在观,放弃了对文艺界的理论分歧的解决。而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吴元迈、陆贵山、仲呈祥、董学文、陈众议则在清理以往文艺理论和重构科学文艺理论的同时,正视并积极解决文艺界的理论分歧,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排斥文艺理论的倾向。

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文艺理论家王元骧较早抵制和批判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排斥文艺理论的倾向。在对话中,王元骧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这种排斥文艺理论的倾向的实质和危害。认为那种没有理论功底和理论深度的、就事论事的感想批评是不可能真正承担起文学批评的使命的。文艺批评如果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就必然是肤浅浮面的,不但难见深度和力量,而且在纷繁复杂现象面前无所适从,只是跟着感觉走以至上批评主体达到完全丧失的地步。王元骧的这种警告在一些文学批评家身上不幸言中。文艺理论家陈众议就对这种文艺批评的现状进行了既尖锐又到位的反思。在对话中,陈众议认为文学批评家既不能对文艺现象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也不能认可“存在即合理”这种粗鄙存在观、为现象当吹鼓手,而是关注文艺现象,却并不被现象牵着鼻子走。文学批评家如果只是跟着现象走,最后就会被层出不穷的现象所淹没。王元骧、陈众议强调文艺理论的反思和批判特性,正视并积极解决文艺界的理论分歧,无疑有助于提升文艺批评的理论品质。

储存的容量上,都大大优于西方其他文字。特别是汉字还是世界上惟一种成为书写艺术的文字。它在文字与艺术、象形与表意的绝妙结合上,堪称世界一绝。说到这里,我想到了鲁迅,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曾为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表示过担心,认为方块字束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融合的手脚。鲁迅早年的这种担心当然有其局限性,到改革开放初年,一些文化界人士也再提类似问题,在报纸上争论不休,甚至要取消汉字,建议走拼音化道路,否则计算机时代会将中国文字抛弃。岂料,随着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对五笔字型输入法的研究开发,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中国文字昂首进入计算机的新时代,现在汉字已经成为世界上输入电脑最快的文字了。有例为证,据联合国机关部门统计,在如今联合国常用的6种文字的文件和书籍中,汉字版是最薄的版本。

文字之争说穿了是国家软实力之争,是话语权之争。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都在用法律形式维护本国语言,法国把每年3月20日定为“国际法语日”,总统在这一天要出来讲话,号召保卫法语。德国人坚决反对德英语言混杂,提倡在德国要讲德语。美国近年也颁布法律,坚决维护其强势英语的地位。在这场文化角逐中,中国既要有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和博大胸怀,同时也要坚决捍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化传统,我们向后人传下去的决不能是不汉不英的洋语,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命根子,是祖宗留给我们的万世基业。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和“汉字英雄”的举办,它提醒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不仪是提笔忘字这个看来表象的问题,更提醒我们汉语的的确确面临着安全问题,我们所有的华夏儿女都有责任为捍卫汉语的文化安全尽一份绵薄之力,而最后的行动就是按汉语的规范写好汉字,用好汉语。

广告		深水		扬子江诗刊	
朔方		唐诗解构……洛夫从《唐诗解构》说起……叶橦		幸福的哲学……周国平作为象征的废墟…阿贝尔 蒋驥	
宁夏文联主管主办 主编 / 哈若蕙		车延高的诗……车延高		游牧者的归途……南 予	
2013年第九期(总第五百三十三期)目录		人邻的诗……人 邻		历史可以这样假设吗? ……朱也旷	
诗坛一瞥		俞昌雄的诗……俞昌雄		一个普通人的“文革”片断……五味子	
忆起辛笛二三事……[加拿大]李怀国		王光明推荐:新诗十九首……王光明		死亡信使(小说)……刘荣书	
怀念父亲——辛笛百年诞辰纪念……王圣群		评《乡愁》……黄 梵		蜂蜜(小说)……王祥夫	
诗人相重——重读卞之琳致辛笛函……王圣思		当代韩国诗人作品小辑……吴生根		李白的家(小说)……姜赋斌	
逃跑……陈集思		徐黎明译		“人物素描”散文小辑	
狐……葛 林		徐黎明译		刘荒田 第广龙 燎 原 卢肖慧	
斯特拉斯堡之约……[奥地利]方丽娜		石英的诗……石 英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检讨书一束	
散文随笔		章德益的诗……章德益		(1951—1952)……马寅初等	
“撵狐孤涂单于”——写给女儿卡迪哈尔的信……Y·C·铁穆尔		中国古代僧人书画家(组诗)……阳 颢		朝鲜纪行(2010)……柳征南	
吃喝……虎西山		回形针 国际航班……路 也		连环图中的《聊斋》……蔡小容	
印象青海……蔡国雄		访 谈 访谈美国诗人施加彰……施加彰 Vs 顾星环		京剧凭什么成了“国粹”? ……文丽敏	
回声(组诗)……刘 涛		诗 讯 “扬子江”诗学奖启动		劣根性——“根的隐喻”与中国现代性启蒙……张未民	
掌纹上的天空(组诗)……颜 溶		地址: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扬子江诗刊社 邮编:210019		解析中国农民自杀……桂 华	
谁用一曲月光聆听(组诗)……李春玉		电话:025-86486051,国内总发行:南京市邮政局		环球笔记5则	
你悄悄去了(外一首)——写在刘少奇同志仙逝处……一 丁		订阅:1.全国各地邮局(所),邮发代号:28-270;2.直接汇款至杂志社邮购(全年45.00元)。2013年5月5日出版。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9-542X,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2-1787 / I。定价:7.50元。		《天涯》杂志已开通淘宝店http://tyzzz.taobao.com,欢迎网购。亦可到邮局订阅或本刊邮购。邮发代号:84-12,双月刊,16.00元/期,全年六期96.00元。平邮免收邮费。如需挂号,需加邮费3.00元/期。邮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人大政协楼六层《天涯》杂志社。邮编:570203。电话:(0898)65360004、65332803。	
诗西部		纳家户访古(纪实)……(回族)杨占武		2013年 第五期要目	
		我的回族兄弟(散文)……蔡 申			
		在回族山村插队的日子(散文)……胡大雷 李 印			
		关于中国画的思考(随笔)……(回族)马知道			
		崇高而执著的人生追求(评论)……(回族)查 舜			
		白先勇作品中的女性与命运(评论)……周逸姿			
		编后……(回族)石舒清			
		访谈与对话 一代人的安魂曲——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访谈录……韩少功 吴超越			
		论 坛 新世纪宁夏作家群体创作印象……贺绍伦			
		《底片》的文体问题及几点文学价值……王佐红			
		以史为马的人——评邱新荣的《大风歌诗坛》……唐 晴			
		新译作 自然观鸟记用…[美国]约翰·巴勒斯 董继平译			
		古诗诗词 诗词十一首……秦中吟 宋彩霞 金丝燕			
		新 月 2013年第九期(总第九期)			
		展现回族风情 凸显地域特色 搭建文化平台 传播友谊理想			
		本刊最新推出刊中刊 专题发表回族文学佳作			
		地址:宁夏银川市文化东街59号(750004) 月定价:10.00元 邮发代号:74-2 电话:0951—3971035			
		投稿邮箱:sf1959xiao@126.com(小说) sf1959@163.com(散文) sf1959shi@126.com(诗歌)			
		sf1959@21cn.com(评论) xylyr2013@126.com(新月)			